

匡亚明 主编

朱义禄 著

颜元 李塨评传 (下)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颜元、李塉评传/朱义禄著. —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,
2011. 4

(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/匡亚明主编)

ISBN 978-7-305-06056-4

I. 颜… II. 朱… III. ①颜元(1635~1704)-评传②李塉
(1659~1733)-评传 IV. B249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83781 号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(典藏版)

颜元 李塉评传

朱义禄 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

(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:210093)

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

网址:www.rulin.com.cn

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开本 660×960 1/16 印张 32.5 字数 365 千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5-06056-4

定价:64.00 元(上、下)

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

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

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》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 王霞林

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
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

学术顾问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
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
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
杜维明(美国) 杨向奎 苏步青
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
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
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
席 文(美国) 唐敖庆 黄辛白
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
戴安邦 魏荣爵

主 编 匡亚明

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

副 主 编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卞孝萱 左 健 孔本栋 茅家琦
周 亮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
蒋广学(常务) 潘富恩

颜元 李塉评传

第八章 颜李学派的影响 及其历史地位

颜李之学是自成一格的事功之学，史称颜李学派。其“别出一派”的品性，令后世学者对它毁誉不一。无论从赞扬者那里，还是从反对者那里，抑或误解者身上，均明显地见到了颜李学派的深邃影响，这一直持续到近代。这一学派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功利思潮的高潮所在。从实学思想研究的角度言，说颜李把明清实学思潮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，也是毋庸置疑的。颜李之学在近代，因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与人们透视它的眼光的变动，它又得到了新的文化上的增值，包含了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新内涵。

一、毁誉不一及其在清代的影响

1. 反对之声

持反对见解者,清代有张伯行、方苞、程晋芳、姚鼐等人,而最激烈者为张伯行,他直截了当地指明颜学为“杀人”的利器:

今天下学术裂矣,李中孚以禅学起于西,颜习斋以霸学起于北。嗟乎!正学其不复明于斯世乎?自程朱后,正学大明,中经二百年无异说。阳明、白沙起,而道始乱,延及中孚,嘘其余烬,一时学者,翕然从之。中孚死,其焰稍息。今北地颜习斋出,不程朱、不陆王,其学以事功为首,谓身心性命非所急,虽子思《中庸》亦诋訾无所顾。呜呼!如此人者,不用则为陈同甫,用则必为王安石,是大乱天下之道也。……艾东乡曰:“李卓吾一字一句皆可杀人。”今习斋之说,亦可以杀人也。而四方响和者,方靡然不知所止,可慨也夫!^①

他抨击颜元,从反对者的角度,把颜元学说宗旨全盘托出。同时他完全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,为维护程朱理学不遗余力。

^① 《正谊堂文集》卷九《论学》。



具体地说,有四点可以分析:(1)以程朱理学为“正学”,为“道统”的合法继承者。程朱理学的出现,是“正学大明”的标志。陈白沙为明初心学之先河,而王阳明则集心学之大成,在张伯行看来,颜学使程朱理学这一“正学”遭到破坏。(2)视李颺之学为“禅学”,以颜元之学为“霸学”,是破坏“道统”的罪魁祸首。中孚为李颺的字。李颺(1627~1705年),号二曲。清初著名学者,与黄宗羲、顾炎武一起,被时人尊为“清初三大儒”。明清之际,清廷以博学鸿词征召之,以绝食坚拒终免。在学术倾向上,重视实学,反对空谈:“道不虚谈,学贵实效,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,康济时艰,真拥衾之妇女耳!”^①“悔过自新”说虽为李二曲自创,但保留王阳明“心上体认天理”的内省方法。清代学者大多认为,二曲之学兼综程朱、陆王而终以陆王为归宿。这是张伯行把李二曲当做“禅学”的缘故。^②与李颺相比,张伯行以为对程朱理学的打击,颜元远远超过了李二曲。因为李二曲死后,“其焰稍息”。(3)说颜元之学为“霸学”,有“杀人”之恶果。“霸学”就是蛮不讲理的学说。艾东乡其人不详,他把李贽学说视做异端,说“可杀人”。张伯行接过话头,说“习斋之说,亦可以杀人”。究其内容,无非是说程朱理学是

① 《二曲集》卷八《体用全学》,中华书局1996年版。

② 颜元曾托人寄著作与信给李颺:“贵地邻邑有李道丈名字中孚者,专讲阳明学,便中求转寄仆之拙著,与兹上道丈书一致意。”(《习斋记余》卷三《寄关中李复元处士书》,《颜元集》第434页)颜元58岁时,“观雉所辑《诸儒学案》。关中李中孚言:‘吾儒之学,以经世为宗。自传久而谬,一变训诂,再变词艺,而儒名存实亡矣。’批曰:‘见确如此,乃膺抚台尊礼,集多士景从,亦只讲书说话而已。何不举古人三事、三物之经世者,与人习行哉!’”(《颜习斋先生年谱》卷下,《颜元集》,第773页)颜元始终关注着李颺,力图与他交往,但又以为他的经世之学不够彻底。



符合人的本性,颜元“必破一分程朱,始入一分孔孟”,自然是“杀人”工具了。(4) 张伯行虽激烈反对,但也承认颜元学说的影响力,即有“四方响和”者。

与李塈有直接交往的方苞,对颜元的攻击也很厉害:

夫学之废久矣,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矣,某不足言也。浙以东则黄梨洲坏之,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。……二君以高名著旧为之倡,立程朱为鹄的,同心于破之,浮夸之士皆醉心焉。……不出于圣人之经,皆非学也。乃昔之蠹学者,显出于六经之外,而今之蠹学者,阴托于六经之中,则可忧弥甚矣。如二君者,幸而其身枯槁似死,使其学果用,则为害于斯世斯民,岂浅小哉!^①

这段文字大意有三点:(1) 清初程朱理学受南北夹击,南方是黄宗羲,北方为颜元。黄宗羲的哲学见解,于陆王有所偏心,尤倾心于阳明,而于程朱则极尽指责之力,这与颜元对程朱、陆王的态度相近。这自然引起程朱理学的卫道者方苞的强烈不满。(2) 以黄宗羲、颜元为学术界的蛀虫。说颜、黄二人“阴托六经”,却在干着败坏“圣人之经”的事情。(3) 断言颜、黄二人的学说,对社会、民众的危害性极大。在给李塈的信中,方苞还祭出了儒家的天神崇拜,为自己主张辩护;“孔、孟以后,心与天地相似,而足称斯言者,舍程、朱而谁与? 若毁其道,是谓戕天地之心,其为天所不佑决矣。故自阳明以来,凡

^① 《方苞集》卷六《再与刘拙修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。



极诋朱子者，多绝世不祀。仆所见闻具可指数，若习斋、西河，又吾兄所目击也。”^①方苞的指责中，竟然蕴含着人身攻击的内容，把颜元、毛奇龄批评程朱与二人无有后嗣的事联系在一起，以人生中的偶然性事例为理由进行攻击，这太缺乏说服力了。^②当然，方苞同张伯行一样，认同了颜学的影响力，即人们“醉心”于颜学的事实。姚鼐的指责，同张伯行、方苞差不多，不再赘述。

祭出天神崇拜去抨击颜李的还有程晋芳，这见于袁枚的书信中：

绵庄寄足下与彼之札来，道颜李讲学有异于宋儒，足下以为获罪于天。仆颇不谓然，宋儒非天也。宋儒为天，将置尧、舜、周、孔于何地？^③

绵庄为程廷祚的字，作为李塨的门人是不会指责颜李的。“足下”为程晋芳，他以为颜李批了程朱，就如同得罪“天”一样。袁枚不同意这种说法，所以反诘之。如果程晋芳主张成立，那么比“宋儒”地位更高的“尧、舜、周、孔”又如何对待呢？程晋芳(1718～1784年)，字鱼门，一字戡园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进士。历官内阁中书、吏部主事、翰林院编修。博学多闻，于经史子集、天文地理、虫鱼考据俱有研究。后参与《四库全

① 《方苞集》卷六《与李刚主书》。

② 晚清李元度云：“近儒最尊朱者推陆桴亭、张考夫，然两先生皆无后，又何咎焉？”(《天岳山馆文抄》卷三十《书方望溪与李刚主书后》)

③ 袁枚：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十九《与程戡园书》。



书》的编写。“喜读书,蓄书五万卷,丹黄皆遍。性好客,延揽四方名流,与袁大令枚、赵观察翼、蒋编修士铨为诗歌唱和,无虚日,由此名日高而家日替矣。”^①袁枚是当时声名极盛的学者,赵翼为著名的史学家,蒋士铨为乾隆时期诗人、戏曲家,时人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。程晋芳与他们诗文唱和,自然名声益彰。他在学术思想上,却是程朱理学的信徒,对颜李之学持反对之见。他的论据与方苞相同,认为批评程朱理学,就是得罪了“天”。“天”不是指客观的自然界,而是能对人间社会发号施令的主宰。天神崇拜是儒家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,它源自原始的部落联盟时期,到殷周时期成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。到汉代,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论作了进一步阐发,以为“天”是有意志的人格神,用天神来论证人世间君权的合法性。此后天神崇拜在社会上滋蔓开来,为统治者、士人、民众等社会各阶层所接受。理学家的天理论,无非是天神崇拜的哲理化形态,只不过是思辨哲学替代了董仲舒的粗糙神学。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夕,资产阶级革命派打出“革天”的旗号,对孔子天命论、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与宋儒天理论作了清算。对民间广为流传的“皇天不负苦心人”、“万事不由人算定”、“各人头上有青天”等信天、畏天的天神崇拜观念,有相当深入的分析。断言中国人精神上“无量的网罗”就是“天”,事情成功归之于“天”,事情失败则言“天”亡我也。^②在封建君权尚处鼎盛阶段的清代中叶,文人学者对天神的崇拜是根深蒂固的。在笃

① 江藩: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卷七。

② 参见朱义禄、张劲:《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》,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157页。



信程朱理学的信徒中,搬出天神崇拜来诋毁颜李之学,认为对程朱的批判就得罪了“天”,完全是出于卫道者的心态。袁枚虽以文学家著称,但古代文史哲是不分家的。袁枚的哲学见解,是同官方供奉的程朱理学相左的。他对颜李之学的认同,放到后面再论。

2. 赞扬之辞

持赞扬态度的有尹会一、邵廷采、万斯同、袁枚、戴望、谭献、缪荃荪等人。

尹会一(1691~1748年),字元孚,号健余,直隶博野人。雍正二年(1724年)进士。此后,历任湖广襄阳府知府、两淮盐运使、河南巡抚、左副都御史等职。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任工部侍郎,提督江苏学政,后转吏部侍郎。这是一位声名显赫的高官。他的思想,虽说倾心于程朱,但具有显明的实学倾向,为学以力行为宗旨。幼年时见过颜元,但尚不理解颜学。“余方十岁时,犹及见先生,魁岸端严,听其议论,娓娓倾四座。自余稍知问学。先生之歿久矣。”^①

尹会一对颜元称赞有加:

行弥苦,守弥坚,德弥劭,遂卓然特立,于世远人亡、经残教弛之余,独行其是而不悔。始予垂髫,每闻乡里间语及先生,辄有“颜圣人”之目,而学者则或笑、或讪,或怒加诋毁,不解其所以。……如先生者,

^① 尹会一:《北学编》卷三《颜习斋先生》。



独勇于自克，跬步必谨，处蓬荜之中而举念不忘乎天下。蜀之日也，越之雪也，群吠所怪，不亦宜乎？^①

尹会一的话有三个方面的含义：（1）颜元在一定范围内，已获得“圣人”这一儒家至高无上的称号。足见人们对颜元的敬仰，已超越了通常的范围。（2）对颜元的德性与学问大加称赞，认为颜元虽处草莽之中，依然有着强烈的经世意识。如同潮湿阴雨连绵的巴蜀，偶尔出了太阳；如同炎热的越地，居然下起了罕见的大雪一样。其为许多小人所非议，实属正常不过的事情。（3）人们对颜元毁声不断，是因为他的主张“独行其是”，是富有独创性的见解，不为人们所理解。

下面分析与李塉有直接交往的邵廷采对颜元、李塉的评议：

习斋先生谓学术至宋儒而歧，诚辟论，非苛论也。何也？宋儒谓静观未发气象，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，是中体落于偏枯，混入佛、老而不自知矣。而所云问学，又止于诵读训诂，凡礼乐兵屯、经世实用，一切蔑略，动而辄括。故终宋之世，竟议论而罕成功。^②

自幼即有必为圣贤之志，后又从游习斋，力驱佛、老，讲求兵农、书数、礼律诸务，综古者小学、大学

① 尹会一：《健余文集》卷八颜习斋先生墓表。

② 邵廷采：《思复堂文集》卷七《答蠡县李恕谷书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。



之教以治其身，体全用具。凡所言行，直本孔、孟，举后世之为程、朱，为陆、王，纷纷角异如衣败絮行荆棘中者，概置勿顾。于圣人之道，真有廓清摧陷之功，用工之勇且实，未有过于足下者。^①

邵廷采(1648~1711年)，原名行中，字允斯，后改名廷采，字念鲁。浙江余姚人，是浙东学派中的一员，其学术以阳明之学为指归，与黄宗羲相近。他的名声在当时并不大，但他在浙东学派中作用至为重要。他上承清代浙东学派创始人黄宗羲，下启浙东学派第三代传人邵晋涵、章学诚等人，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性人物。邵廷采略后于颜元，而与李塨同时且与李塨有书信往来。他对颜李之学的论定，有着直接的感性因素在内。他以为颜李学派的功劳，是恢复孔、孟的“圣人之道”，重树了经世致用之学。(1)认为“宋儒”蔑视“经世实用”，而把注意力集中在“诵读训诂”上。“宋儒”是指程朱理学，其中混入了佛、老的内容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儒学，此即“习斋先生谓学术至宋儒而歧”中的“歧”的真实涵义。(2)认为程朱理学只讲个人的心性修养，“静观未发气象”，其学对社会不产生任何实际效果。(3)颜李之学要礼赞，是由于强调经世致用，“讲求兵农、书数、礼律诸务”。以为这是恢复了孔、孟圣贤之学的本来面目。这三条理由与邵廷采的学术倾向有关。邵廷采推崇阳明学，不满程朱，对颜元批评程朱是赞同的。邵廷采为学，强调经世致用。认为于经学之外，别求心性，失却圣人作经本

① 邵廷采：《思复堂文集》卷七《答蠡县李恕谷书》。



意,力主“明经将以致用”。^①他深契其师黄宗羲治学的真谛。黄宗羲在学风上讲究学问与事功的统一,“道无定体,学贵适用,奈何今人执一以为道,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”^②。邵廷采早年著《规心录》一书,着重于内圣之学。黄宗羲读了以后,认为这种与实际事物无关的书还是不作为好,邵廷采听了以后就将《规心录》付之一炬。可知邵廷采的学术宗旨与颜元、李塉基本上是相同的。依据以上分析,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,清代学者对颜李之学的赞扬与抨击,是同他们本人的学术倾向息息相关的。大体上是相近者誉之,相异者毁之。

被时人誉为学术泰斗的万斯同,对李塉评价很高。万斯同以为,李塉是孔孟之学的继承与发扬者,学术上造诣高深,“负圣学正途,非余所敢望”^③。这方面的内容,放在《李塉评传》中详论。

从袁枚对程晋芳的态度中,不难发觉袁枚是站在赞同者队列里的。袁枚是18世纪士林中有号召力的一位大学者,不能以文学家将其局限之。袁枚(1716~1798年),字子才,号简斋,浙江钱塘人(今杭州)。天资聪明,为当地士人所赞叹。21岁时,作《铜鼓赋》,不加修改,挥笔立就。在博学鸿词科应试的200多人中,袁枚的年龄最小。乾隆四年(1739年)进士,后为翰林院庶吉士。历任溧水、江浦、沭阳、江宁等县知县。绝意仕途后,在江宁小仓山下,修治随园。学者称随园先生。著作有《随园诗话》、《小仓山房文集》、《子不语》等。以诗

① 邵廷采:《思复堂文集》卷十《诗经儿课小引》。

② 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0册《姜定庵先生小传》。

③ 恽鹤生:《李恕谷先生传》,《李塉年谱》附录二。



文为海内文人学者所推许,达60年之久。他的“性灵”说,强调写个人的性情际遇,重在个人心灵的抒发。这一要求摆脱传统束缚的主张,是有它的哲学基础的。在理欲之辩上,他指责理学家禁欲主义的复性说,认为“性不可见,于情而见之……善复性者,于不空冥处治性,而于发现处求情”^①。这是汤显祖的主张在18世纪中叶的复活。^②他重视人的情欲,以为圣人不可无情:“古圣贤未有尊性而黜情者。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、欲此七者,圣人之所同也。惟其同,故所欲与聚,所恶勿施,而王道在焉。”^③圣人是常人的楷模,故常人的七情六欲也是不可禁绝的。这种“王道本于人情”的主张,无疑有着冲破理学禁欲主义的进步意义。这与颜元所主张的“人欲为人之真情至性”具有异曲同工之处。因而他不同意程晋芳对颜元的无端指责,断言“宋儒非天也”。认为从天神崇拜的角度去指责颜元,道理上是讲不通的。

袁枚以为,颜李学派的独创性是毋庸置疑的。他说:

《黄氏日钞》称吕希哲习静,其仆夫溺死不知。张魏公自言有心学,符离之败,杀人三十万,而夜卧甚酣。宋学流弊一至于此,恐周孔有灵,必叹息发愤于地下。而不意我朝有颜李者,已侃侃然议之。颜李文不雅驯,论均田、封建太泥,其论学、性处,能于

① 袁枚: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二十三《书〈复性书〉后》。

② 汤显祖云:“盖离情而言性,一家之私言;合情而言性,天下之公言。”汤显祖是从“公私之辩”的角度出发,把情抬高到“天下之公言”的高度。袁枚则从性的未发与已发的角度,强调了人性的把握是在情的显露处。

③ 袁枚: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二十三《书〈复性书〉后》。



朱、陆外别开一径。^①

吕希哲为北宋学者,与程颐同学于胡瑗,后师事程颐。为学主静,“衣食不给,有至绝粮数日者,处之晏然。静坐一室,家事一切不问”^②。为了在静坐中体验出某种特殊的心理感受来,吕希哲能不惧绝食。自己尚且如此,对家中其他人自然也不会关心了,实在是理学家中一位主静的典范。武将打了败仗,还自以为有“心学”为安身立命所在,依然能安心睡觉。这是一点儿也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,也是理学空疏学风的体现。袁枚读了黄震的《黄氏日钞》,深感宋明理学的弊病之甚。因而对颜元、李塈指明宋明理学的弊病,创出“别开一径”新说,是持肯定态度的。袁枚以为,不能因他们在土地、政治等方面的复古倾向,而抹杀他们学术上的功绩。袁枚在人性论上与颜元是同调的,他也反对宋儒人性二重化之说:“宋儒分气质之性,义理之性,大谬。无气质,义理何所寄耶?亦犹论刀者,不得分芒与背也,无刀背则芒亦无有矣。”^③在袁枚心目中,气质之性是人情人欲的根源。如同刀一样,没有刀身就无法谈论刀的锋利。这里,袁枚立论的基础还是沿袭了南朝时期范缜的“形神相即”、“形质神用”的主张。这同颜元反对理学家“言性为二”的主张与“若无气质,理将安附”的见解,是完全相合的。

气味相投,所见相同,故袁枚于程晋芳对颜元的指责大为

① 袁枚: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十九《与程戴园书》。

② 《宋元学案》卷二十三《荜阳学案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③ 袁枚:《牍外余言》卷一。



不满,加以反驳:

足下之言曰:“无宋儒,吾辈如禽兽而木石矣。”
 尤误也!足下亦思汉魏晋唐无宋儒,其间千余年,皆
 禽兽而木石?亦思以孔子之圣,不能挽战国之末流,
 而以宋儒之贤,乃能救后世之习俗乎?足下惧畏获
 罪于宋儒,并甘心获罪于孔子者,又何也?①

这自然令人想起了李贽了。李贽不以孔子的是非为判断真理的标准,写了《赞刘谐》一文,抨击了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”的论调。认为按这种说法,“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!”②袁枚的主张与李贽有别。李贽批孔,故举出“羲皇”更为古老的圣人来;袁枚不批孔,所以用抬高孔子来贬低“宋儒”。袁枚这段话有两层意思:(1)依着程晋芳的主张,世上无有“宋儒”的话,从汉朝至唐代的人们,都为“禽兽木石”了。这从常识上是说不通的。(2)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,也无法挽救当时的弊端。那么以“宋儒”之“贤”,就能够救“后世之习俗”吗?这两条都是从圣人崇拜的角度着眼的。在圣人崇拜成为古人心理定势的时代里,这样的反问是很有说服力的。袁枚虽对颜元的复封建、行井田的主张有所讥语,但他对程朱理学的尖刻抨击,与他受颜元思想影响所致不无关系。因袁枚与李塨学生程廷祚为至交,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相同处甚多。当程晋芳与程廷祚

① 袁枚:《小仓山房文集》卷十九《与程戴园书》。

② 李贽:《焚书》卷三《赞刘谐》。

